

广西和云南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的历史考察

郑一省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 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的途径、原因,以及其移民网络有着某些显著的特征。国际性移民、集体性移民、陆路性移民和地缘性移民,是广西和云南少数民族移民的特点,而集聚式移民、发散式移民、强制式移民和自发式移民则是两地移民的主要方式,这些移民在长久的移民过程中,也建构出生计性迁移网络、亲缘性迁移网络和马帮性迁移网络。

[关键词] 广西; 云南; 少数民族; 移民模式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072(2014)07-0009-09

中国是一个移民大国,有着悠久的移民历史和庞大的海外移民群体。但人们提起中国的移民,更多的是想到广东、福建和浙江等沿海一带的汉族移民,对其他移民特别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移民关注不多,对少数民族向外移民的研究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从广西和云南来看,其境内居住着壮、傣、布依、苗、瑶、彝、哈尼、拉祜、仡佬、京等众多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居住地与邻国山水相依,因而他们与邻国人民交往密切。可以说,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代,广西和云南的少数民族都存在着向海外移民的现象。研究这些少数民族的向海外的移民,对稳定边疆,以及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有着积极的作用。

移居到海外的广西、云南少数民族移民,他们已成为世界移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汉族移民相比,广西、云南的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的特点、方式,以及其移民网络有着一些显著的不同。

一、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的特点

在中国封建王朝,由于统治者奉行大汉族

主义思想,对“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称之为“蛮”,认为其是“化外之民”,倍加歧视。少数民族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移居他乡。而在当代,由于受到世界局势和中国国内政策的某些变化的影响,也屡屡发生广西、云南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的情况。

从历史来看,广西、云南少数民族向海外的移民首先具有国际性移民的特点。这种国际性的移民,即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后,在一定的时期又迁移到其他的国家。具有这种国际性移民特点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瑶族、苗族、傣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和佤族等。以瑶族为例,瑶族本是中国的一个民族,而现在却是一个国际性的民族。据学者研究,1990年海外瑶族总人口约60万。其中越南瑶族人口最多,约50万人,泰国3.61万人,老挝3万人,缅甸0.1万人,美国2.5万人,加拿大0.1万人,法国0.1万人^[1]。这些移居海外的瑶族,迁移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广东进入越南,二是从广西经云南进入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国。范宏贵教授认为,瑶族迁越的时间可能始于公元13世纪,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他说:“越

[收稿日期] 2013-07-13

[作者简介] 郑一省(1959—),男,广东梅县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广西侨乡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基金项目] 国家民族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跨境民族研究基地”成果

南瑶族是从中国迁徙到越南的。最早的一批是在13世纪从中国广东、云南由陆路进入越南，先在广安、谅山、高平越中边境一带，然后再转迁到其他地方。第二批是白裤瑶和贺瑶，于15世纪、16世纪，从中国福建、广东，主要是水路，其次是陆路迁到越南。第三批是窄裤瑶和钱瑶，于16世纪从我国海南岛乘船迁到越南，途中遇到台风袭击，一些船漂到越南芒街，另一些船漂到越南清化。第四批是青衣瑶，17世纪从我国广东迁到越南芒街，然后再转到安沛、老街一带。第五批是18世纪从中国云南省迁到越南老街的红瑶和从中国广东、广西迁到越南高平、河宣的钱瑶、红瑶。第六批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越南的芦岗瑶，芦岗瑶意即晚到的瑶族。”^[2]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东南亚局势的变化，一些瑶族又作为难民而迁徙至美国、法国等国家。

其次，集体性的移民是广西、云南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的第二个特点。与汉族大多数为单个移民不同，广西和云南的少数民族向海外的移民大都采用集体性移民的方式。这种移民方式主要是受生计性迁移网络和亲缘性迁移网络的影响，即整个族或全寨的族人向外迁移。据历史资料记载，宋景定四年（1263年）。广西思明府土官黄炳曾率领壮族部属1000多人到安南居住。民国7年（1918年）夏，宁明县那岩村共有200多壮族农民，扶老携幼移居越南^[3]¹⁷。1949年以前，在今广西防城港市沿中越边界的板八的某村屯原有120多户高栏人，后来有50多户迁移到越南了^[4]。

与中国广东、福建和浙江的海外移民相比，陆路性的移民是广西、云南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的第三个特点。中国广东、福建和浙江的移民大多居住沿海地带，其移民海外主要是通过海路前往，而广西、云南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却大都属于国境线上的崇山峻岭。从中国与周边国家来看，两者有着漫长的陆地边界线。其中，中国与越南有着1353公里的陆地边界，与老挝有505公里陆地边界，与缅甸有2186公里陆地边界。

广西与越南接壤，沿边千百余公里。在广

西与越南漫长的边界线上，除防城北仑河下游地区稍微平坦外，整个边境多为连绵高峻的山石土岭，纵横交错，有无数羊肠小径与边境两地相通，这些都为广西少数民族移民流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正如某位学者所说的，“广西少数民族移居国外几乎都取陆道而迁，特别是中越边境地区，土地接壤，山水相连，通道众多，不仅有三条官方大道，而且有30多条民间通道，崇山峻岭的羊肠险道更多，陆上交通甚为便捷，从农村到农村，从山区到山区，从少数民族地区到少数民族地区，人文、生态环境未变，生活、生产方式未改，从而较快地成功地融于‘迁入地’的民族主流社会”^[5]。云南所处的云贵高原，有众多的海拔数千米的山脉，与缅甸北部的掸邦高原、泰国北部、老挝北部即越南北部的山地相连。自古以来，这些独特的地理条件就为当地人向外自由迁移提供了条件。如云南文山州的山区、半山区占其总面积的94.6%，州内的麻栗坡、马关、富宁3个县15个乡镇249个村寨及1个国有农场与越南接壤，国境线长438公里。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112.39公里的云南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全境山地也占其总面积的95%。处于这种地理条件之中的云南少数民族，向外移民就必须翻山越岭“走夷方”，经陆路前往其移居地。

由于广西、云南处于中国与西南周边国家的接壤地带，地缘性的移民是这两个地区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的第四个特点。就地缘角度而言，毗邻的地缘体之间存在的人员交往和沟通等相对于其他地缘体而言必然要频繁得多，这就决定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移民的移出地与毗邻周边国家的移入地有着天然的联系。从广西、云南两地来看，其移民有着较强的地缘性，即各自朝着最毗邻的国家地区移民。

毗邻广西的主要周边国家是印支三国，因此广西少数民族移民移居这几个国家的人数较多。例如，今广西靠近越南一侧的县（区）市有防城港、宁明、凭祥、龙州、大新、靖西、那坡等，而越南一侧的省是广宁、谅山、高平和河江。历史上，靠近越南这些省份的广西一些地方就经常发生当地少数民族向其移民的情况。据资料

显示,元朝以后,大批壮族居民从今广西的田东、德保、靖西、天等、大新、宁明和龙州等地迁入安南。清朝时期,迁入安南的壮族群众更多。仅防城就有2万多人。民国时期靠近中越边境的今广西南明、龙州和大新等县,有数万居民迁往越南谋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然有少数壮族从中越边境入越居住,那坡县从1958年到1961年,迁移越南的壮族居民就有1000多人^{[3]18}。同样,云南也具有这种地缘性的关系。在云南,毗邻越南、老挝、缅甸的地方有文山、红河、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德宏、怒江等州市,移居周边国家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与云南直接接壤或接近的几个国家,其中主要是分布在与云南直接接壤的邻国缅甸、老挝、越南及泰国等。19世纪上半叶,腾冲一带回族即有许多人移居缅甸。当时,“腾之回教则以城内外、乌索、马家村三地最为着。……嘉道间……旅居缅甸为玉石、宝石、棉花商者半属之”^[6]。

现代的政治疆界可能将原本生活在一个区域的同一个民族分割成为不同国家的国民,但是并不能隔断这些民族之间的联系。他们虽然长期分居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受到当地主体民族或其他民族的影响,但是彼此之间依然基于共同的语言、服饰、风俗的同一性而保持着很强的民族认同感,而且地缘性这种情况为同族文化的移民提供了非常好的便利条件。

二、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的方式

不同的民族,由于其自身的条件,以及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客观的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向外移民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移民方式。从移民方式上看,历史与现实中的广西、云南少数民族向海外的移民大致可以分为集聚式移民、发散式移民、强制性(被动性)移民和自发性(主动性)移民。

第一,集聚式移民。这种集聚式移民,指的是一些民族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向某一地区集中,形成以某一地区为中心的民族聚居状况。集聚式移民,在广西和云南的少数民族移民方式中不太多见,仅有佤族、景颇族等少数几

个民族的移民具有这一特征。这几个民族的居住中心都是在迁徙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且都跨越了国境的界限。

佤族现在的居住中心是阿佤山。所谓的阿佤山,系指在澜沧江、怒江之间,怒山山脉南段的一个地区。这里山岭重叠,地势自北向南倾斜。境内群山并立,海拔高度在2000米左右,有大小山峰10多座。阿佤山是澜沧江和怒江的分水岭,有大小10多条河流分别流入澜沧江和怒江。阿佤山这个居住中心是跨越国境的,它还包括缅甸境内与我相邻的佤区,习惯上人们称缅甸这个佤族人聚居的地区为佤邦山区。佤族形成以阿佤山区为中心的分布格局,是与国内外各民族关系互动的结果。历史上,佤族的分布地域非常广,大致包括今天的云南保山地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地区、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以及境外缅甸的兴威(木邦)和景栋、泰国的清迈等地区均有佤族居住。自唐代起,佤族分布区的各个民族开始大规模的迁徙和融合。唐朝初年,南诏政权兴起,引发了一次民族迁徙高潮。在南诏统治时期,不断强迫民族迁徙。如把西爨20万居民迁至保山一带的永昌地区,又将原永昌地区的居民迁往内地。在这种情况下,永昌地区的一部分不愿内迁的“濮人”(佤德语支民族)被迫向南迁移,迁移到云南的西南地区。到了元、明、清时期,中原王朝的统治达到了佤族的分布区,傣族的势力也进入佤族分布区,拉祜族也在向佤族地区移民。由于外来民族不断向佤族分布区移民,引起佤族居住区域的内缩,除一部分佤族继续与其他民族交错而居,接受其他民族的影响外,大多数佤族选择迁徙,向阿佤山区集中。在境外,佤族也遇到了相同的遭遇。公元7世纪时,在今天的泰国北部及缅甸的东北部一带,与佤族属同一个语族的孟人在今天泰国的南奔建立了一个名叫“哈里奔猜”的国家,在“濮人”南迁的过程中,佤族的一个支系罗佤人可能就在那时候迁入到“哈里奔猜”国统治的泰国北部地区,并在公元11世纪到公元14世纪建立了一个名叫“罗斛”的佤族国家。14世纪中叶“罗斛”与暹罗合并,泰人大量进入泰北

地区,罗佤人逐渐沦为少数民族,于是大量回迁祖先的居住地阿佤山区,只有少量的罗佤人留在泰北,自称“佤库特”(被遗弃的佤族)。佤族人大量地向阿佤山区迁徙,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集聚式移民。

景颇族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也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民族分布格局。景颇族的地域分布比较广,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一直向东,经缅甸西北部,直到我国云南省境内的高黎贡山和怒江的广大山区都有景颇族的各个支系分布。但是,景颇族同时又是一个分布相对集中的民族,位于今天缅甸境内恩梅开江、迈立开江汇合处的江心坡一带是景颇族的一个相对集中的聚居地,境内外大多数的景颇族都聚居在江心坡及其周围地区,我国景颇族的主要分布地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从地理上看就属于江心坡的周围地区。从景颇族的若干家家谱传说看,景颇族在江心坡一带居住一般经历了40~50代,也就是1500~2000年的时间。我国境内的景颇族都是从江心坡一带迁徙过来的,他们在公元14、15世纪以后从江心坡南下,在渡过伊洛瓦底江之后向东进入今云南省德宏一带。景颇族向江心坡及其周围地区的迁徙,总的来说,也可以算是集聚式移民的一种。

第二,发散式移民。这种发散式移民指的是居民离开原来的居住地,向周边地区进行扩展式移民活动,这类移民具有明显的从中心向外扩散的特征。从广西和云南少数民族向海外的移民方式上看,绝大多数的移民都具有发散式移民的特性。

傣族的移民是一种典型的发散式移民。傣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源出中国古代的“百越”族群,是这个族群最靠近西边的一个支系。至少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到达云南西南部及其周边地区,在汉代被称为“滇越”、“掸”等。大约在唐宋时期(即南诏、大理国时期),傣族形成了“金齿”、“茫蛮”、“白衣”三部(即今德宏傣族、西双版纳傣族和金平傣族)。到元末明初时期,傣族各部,尤其是“金齿”部兴起,建立了较为强大的部族政权,并向周边地区扩张。12世纪末,“茫蛮”部在今西双版纳一带建立

“景咙金殿国”,统治区域及于兰那、勐交、勐老、崆崙等地,也就是除西双版纳外,缅甸东北部、泰国北部、老挝北部等同族的一些部落,皆受其统治。公元14世纪,属于“金齿”部的麓川思氏兴起,并于1336年建立勐卯国,思氏被尊为思翰法王。思氏登位之后,附近的掸人王国纷纷前来归附,勐卯国的势力急剧膨胀。1337年,击败元军对勐卯的征讨。1343年,勐卯军追击元军,渡过南宏江(怒江),直抵大理府。之后,勐卯开始向外扩张,决定恢复对南鸠江(伊洛瓦底江)沿岸地区的控制。1348年,思翰法王调集数万军队,二千战象,命王弟召三弄挂帅,前往南鸠江以西各国征讨,三年后才结束西征。召三弄的此次西征,使得勐卯国的疆土扩展到伊洛瓦底江以西的广大地区。除向西扩展外,鼎盛时期的勐卯国疆土还不断地向东、向南扩展。据《嘿勐活勐——勐卯古代诸王史》记载,“至思翰法为王的第二十九年,勐卯国的疆土,已经越过永昌,与大理国为邻;下达果景、刚嘎,以大水为界;南至那狠、勐老和勐阔;西至罕底,以嘎洗河为界,与勐滚国相毗连;北方一直到了纳亨。”这与明初钱古训的《百夷传》所记的勐卯国疆界大致类似:“其地万里,景东在其东,西天古喇在其西,八百媳妇在其南,吐蕃在其北;东南则车里,西南则缅甸,东北则哀牢,西北则西番、回纥。”只要居住条件适合,傣族军队征讨到哪里,傣族移民也就跟随到哪里。在傣族军队四处征讨的过程中,傣族移民也在四处扩散,即使在一些远离勐卯的偏远地区,也有傣族移民的足迹,比如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有一个名叫“阿洪姆”的族群,他们就是从勐卯迁移过去的傣族人的后裔。在勐卯全盛时期,大量的傣族人迁移到缅甸南部、泰国北部、老挝北部,甚至还包括越南西北地区。在不同时期,傣族各部都在向周边地区进行发散式的移民,这种持续的发散式移民最终形成了傣族地域分布广泛的格局。

苗族、瑶族等民族向海外的移民是另一种类型的发散式移民,由于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他们不断地向海外移民。苗、瑶等民族在历史上并没有建立过强大的民族政权,他

们的移民不是依靠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来实现的,而是依靠一种迁徙的惯性,采用“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的方式,经过长时间、多批次的迁徙后完成的。苗、瑶等民族的移民,“散”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色,既表现为移民动因方面的随意性,又表现为移民方向的随意性和自发性。

第三,强制式移民。这种强制式移民,指的是本来没有移民意愿,但受外力因素的影响,被某种力量强制推动或拉动而出现的移民。从广西和云南来看,历史上的被动性移民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因外国侵犯边疆和因战争中被掳走的移民,二是少数民族因国内统治者的压制揭竿而起而被迫逃离的移民。

强制式移民的第一种类型:即被外国侵犯边疆和因战争中被掳走的移民。这主要是一些周边国家利用中国某个封建王朝对边疆尚未达到有效控制的弱点,侵犯中国边境,掳掠中国边境的边民。这一类的移民在广西的壮族和云南的傣族移民中比较多见。据史料记载,公元9世纪越南开始成为中国的藩属国,从藩属国的前黎朝开始,在初步稳定统治后,便寻求对外扩张。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熙宁八年(1075年)越南李朝“大举入侵,攻陷钦、廉、邕州,兵民死者十万余口,掳妇女小弱者七八万口”^[7]。仁宗黄庆二年(1313年)正月,越南陈朝派军“约三万余众,马军二千余骑,犯镇安州(今广西德保县)云洞,杀掳居民,焚烧仓廩庐舍,又陷禄洞、知洞等处,掳生口孳畜及居民资产而还,复分兵三道犯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县),屯兵未还。廷议俾湖广行省发兵讨之。四月,复得报:交趾世子亲领兵焚养利州(今广西大新县)官舍民舍,杀掠二千余人”^[8]。永乐九年(1411年),越南陈朝侵犯广西钦州,“濒海居民,颇遭劫掠”^[9]。宣德三年(1428年),越南后黎朝在钦州如昔都峒“掳民人一十余家,掠去男妇八十余口”^{[10]41}。正统三年(1438年),越南后黎朝“攻掠广西安平、思陵二州,掳掠安平州(今广西大新县)男妇二百二十余口,掳掠思陵州(今广西南明县)霸村男妇四十余口”^{[10]43}。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崇祯二年(1629年),越南后黎朝分别侵犯广西钦州,“掳掠以去”等等。以

上所列举的被越南历代王朝侵犯、掠夺人口的地区,主要是壮族聚居的钦州、廉州、邕州地区,因此这些被掳掠的壮人便成为早期强制性的移民;在云南,因侵扰性战争而被强制性移民在一些少数民族中时有发生。明朝末年和清朝中期,缅甸的封建王朝东吁王朝、雍籍牙王朝先后发动了几次对我西南边境的侵扰性战争,这几次战争对云南沿边的傣族地区影响较大,很多傣族人口在战争中被掳掠到缅甸为奴。万历十一年(1583年)一月,缅甸的东吁王朝侵扰云南的施甸地区,“攻雷弄、盏达、干崖、南甸、木邦、老姚、思甸等处,据地杀人;窥腾冲、永昌、大理、蒙化、顺宁、景栋、镇沅、元江等郡,又寇顺宁(今云南凤庆),烧毁府治,遂破盏达(今云南盈江县莲花街)掳男妇八百人”^{[11]53}。天启七年(1627年),东吁王朝的军队进攻云南车里,掳掠车里宣慰史刀韞猛以及十二版纳江西各地居民到(缅甸)阿瓦,第二年才有少数人逃归^[12]。

强制性移民的另一种形式,是因反对国内统治者的压制揭竿而起而被迫逃离的移民。以这种形式向海外移民的少数民族,在广西和云南主要有壮族、瑶族、苗族和回族等民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少数民族所遭受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以及所受的痛苦远远大于汉族,因此反抗斗争连续不断。在广西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史上,除了有在1376—1579年期间发生的延续200多年的八寨(今广西忻城、上林两县交界处的8个村寨)壮族民众反明起义外,还有1386—1627年的大藤峡地区(今广西桂平、武宣一带)瑶民起义、1376—1584年的府江(今称桂江)瑶族农民起义、1407—1620年的马平(今广西柳江县)壮民起义、古田(今广西永福县寿城一带)瑶壮民起义。在云南,也有1856—1874年杜文秀领导的坚持18年之久的回族大起义等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少数民族主导的历次反抗斗争虽然给当时的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与疯狂追捕下,不少的少数民族民众被迫逃往国外避难。

第四,自发式移民。这种自发性移民呈主动性的特征,它主要与少数民族移民的生计方

式密切相关。相比较而言,广西和云南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的主流应该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发生的自发性移民。在广西、云南的沿边地区,无论是中越边境、中老边境,还是中缅边境,过耕问题长期存在,而且往往跟游耕农业联系在一起,游耕农业则容易引发自发性移民。此外,其他一些因素,如同一民族的互婚、寻亲等,也容易导致自发性移民的产生。这种自发性移民与强制性移民的最大区别是移民意愿的存在,自发性移民往往都有比较明显的移民意愿。由于自发性移民大多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所以这类迁移往往很少见于史料记载,从而给后人造成不存在这些迁移的错觉。自发性移民的绝对数量并不少,但却非常分散,缺少大规模的移民,因而往往不引人注意。自发性移民通常是由人口稠密区(相对而言)流向人口稀疏区,由经济发达区流向落后区,由中心区流向边缘区。移民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生计,或者为了寻找新的可耕地,有的甚至只是出于迁移的习惯,只要在迁移地有地可种,一般都会留下来定居。也有的在迁移到一地若干年后,继续选择迁移,直到找到满意的居住地。

广西和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都带有游耕农业的特色,迁移和多次迁移往往很容易发生。比如瑶族、苗族等民族自古以来生活迁移多变,有“常住青山千万山”,“吃尽一山过一山”的习俗。据日本竹村卓二先生在调查泰国北部清莱府夜庄县帖莱村邓氏(邓福昌夕的世系时),证实了邓氏11代前的祖先,埋葬于中国的广东省。竹村先生在泰国、老挝收集的“泰国北部瑶族起源传说”和“老挝流传的神话概要”,也分别叙述了瑶族的来源:泰国的瑶族起源于中国的南京,从南京迁到广东的乐昌县,随后移居广西,人口的增加,土地的不足又造成他们大举迁移,一部分到了云南,一部分到了法属的琅勃拉邦(老挝)等地,一部分来到泰国。而老挝的12姓瑶人“渡海上岸”后到达广东的韶州府,以后一部分向湖广进发,一部分以贵州为自标,还有一部分到广西寻找安居之地,后迁入云南。老挝的瑶族大都是18世纪末叶从中国南部迁去的,20世纪也有陆续从越南迁入^[13]。

三、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网络模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移民网络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移民网络是在某一群体迁移到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达到一定数量后形成的社会网络。凡是出现移民的地方,往往也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这样的社会网络。一旦形成这样的社会网络,就会吸引更多的人移民,更多的移民又会使移民网络不断扩大,反过来又会吸引新的移民,如此反复,使得移民网络越来越庞大,使得网络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网络的不断扩大,使得新的移民不断涌现。从本质上说,移民网络的效应是累积的。一般情况下,每次迁移都是在利用先来者的社会资源,同时也在为后来的移民作铺垫和牵线搭桥。所以,移民网络具有乘法效应,许多人之所以会选择移民,就是因为在在此之前有人移民在先,而且这部分人跟他们还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有关移民网络的理论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威廉·托马斯和弗洛瑞安·兹纳列亚基那里。他们认为,对移民的考察和解释应以移民网络为纲。这种移民网络指的是移民或返国移民同亲友同胞间的种种联系。它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如通风报信,助人钱财,代谋差事,提供住宿等等。这就降低了移民的成本和风险,使得川流顺畅。道格拉斯·梅西(Massey D. S.)则受到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以及皮埃尔·布厄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资本论”的启发,将移民网络看作是一种社会资本。他认为,许多人之所以移民,是因为跟他们有关系的人移民在先。网络具有乘法效应,网络在移民中扮演的“资本”角色。再者,网络是使移民现象长盛不衰的机制。网络从本质上说是累积的。它总要长得更大更紧,因为每次迁移都成为后来者的资源,都在为以后的迁移牵线搭桥。而新的迁移又导致了网络的扩大和进一步的发展^[14]。笔者认为,移民网络实质上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移民网络形成后,一方面使移民信息可能更准确、更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使移民成

本可能因此而降低,从而不断推动移民潮。

广西、云南共计有38个民族,其中向海外移民达到一定规模的占到一半以上。在这些少数民族的民众向海外移民的过程中,移民网络所起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甚至可以说移民网络是移民最重要的要件之一。与中国汉族相比,广西、云南少数民族在长久的移民过程中,产生了与汉族移民不同的移民网络模式,其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生计性迁移网络。由于地理原因和生活习惯,有许多少数民族在历史上过着刀耕火种的游耕经济生活,因而形成了一种“择土而耕,迁移无定”的生计性迁移网络。明朝,防城的山由(山瑶)族(瑶族的支系),从中越边境山区迁移到安南沿海的黄竹、高山、下居和先安,然后散居在海宁省的潭河、芒街、横浦、冒溪和东潮等地。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广西部分瑶民迁到安南便面府、猛科、猛天和十八天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又有部分瑶民从广西经云南迁入老挝,进入藻怒、猛赛、南地和猛信等居住^{[3]18}。这些迁移大多与游耕经济生活有关。

除了游耕经济生活外,生计性迁移网络还与寻找工作环境有联系。这种移民网络帮助移民安顿下来,或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或从事其他劳动。1958年“大跃进”时,云南省镇康县南伞乡白岩大寨的德昂族和蚌孔上寨的傣族举寨外迁,他们最后落脚的是缅甸果敢地区的崩龙人、傣人村寨。瑞丽勐卯的傣族男子金福元,20世纪70年代曾在亲戚的带领下到缅甸谋生,改革开放后,国内形势好转后又回到瑞丽。在访谈过程中,他向笔者介绍了一些在缅甸的生活情况:“到缅甸后,在亲戚的介绍下,我去了一个叫抹谷的地方,在那里替人挖宝石。由于是帮人挖宝石,收入不是很多,只是够维持一个人的生计。后来,我在这里结识了我的妻子,妻子家也是从国内迁来的,是陇川的傣族。他们家来缅甸的时间要比我早,大概是1958年前后。由于我们都是傣族人,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一致,因此很快就走到了一起,结婚生子。”从金福元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出,移民网络在

移民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不但为移民牵线搭桥,而且还给移民介绍、安排工作。经过移民网络的安排,有时候来自德宏的傣族移民甚至在国外结成新的移民社区,例如在缅甸的抹谷,来自云南德宏一带的傣族移民就聚居在一起,结成新的移民社区。腾冲一带的傣族,有很多人移民到缅甸,大多数都选择居住在密支那一带。他们往往都是举家外迁,并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和网络,并且通过这些网络与国内的傣族同胞保持联系。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一些在缅甸的傣族生活情况:“居住在缅甸的傣族大多选择聚居,密支那就有‘傣一条街’。在缅甸的傣人实行族内通婚,主要原因还是语言相通,容易融合到一起。在缅甸的傣人也有自己的组织,主要是依托基督教书建傣族文化协会,因为傣人多数属基督教徒。”1956年云南省马关县马鹿塘乡南哈寨有4名瑶族群众外逃(迁居)越南,在他们迁居越南的过程中,有两个人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邻县麻栗坡县那赛乡有一个名叫盘小引的迷信职业者派他的弟弟盘有才到南哈进行鼓动,宣称“我们地方建社了,不得去麻栗坡县栽地了(因南哈种植的棉花地和麦地均在麻栗坡县境内)。我们地方这点土地种了养活不了我们了。在上边要卖余粮,烤酒吃也要上税。在小营(越南境内的一个村寨)每年又不卖余粮,只要上点公粮。”在盘有才的鼓动下,4名瑶族群众最终迁居越南。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盘有才负责进行鼓动,盘小引则负责将人带到越南,分工明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移民网络所发挥的作用。

二是亲缘性迁移网络。这种移民网络,其构成的要素包括家庭、家族和同村族人等,这是一种基于血缘、情缘、乡缘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一般情况下,这种类型的迁移多数是来自同一家庭、家族(有时甚至是同一个村寨)的人结伴而行,前往同一个目的地。迁移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境外的移民网络派人到相关村寨进行鼓动和游说,商定迁移的时间、路线等;然后有意移民的人员集中在一起,在商定的时间按照商定的路线出境;人员出境后,境外移民网

络派人前来接应,并带往指定的目的地。由于地理环境的特点,中国与邻国的跨国民族山水相依,“同砍一山柴,共饮一江水”,经济、文化交流较为密切。这些跨国民族在地理空间上远离政治中心,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与国外同民族的交流即使在两国关系恶化时也没有中断过。当中国这一侧的民族遭遇困难时,在国界线另一侧的同民族成员会施以援助,对于那些越过国界线的异国同胞,他们会像家人一样对待。这不仅是因为同一民族的缘故,还因为有着亲缘关系。跨国界而居的少数民族在平时的交流中,由通婚而结成的亲缘关系不在少数。当中国的少数民族移居另一国时,移居国的同民族亲戚通常会给予非常大的帮助。同时,通过同一民族的帮助,移民也较容易融入当地社会。这种亲缘性迁移网络关系对于边境的移民而言,是在交往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优势资源。

例如,云南德宏傣族一般只会向邻近的缅甸掸人居住区移民,因为掸傣为跨境而居的同一民族,傣族人向这些地区移民,往往能够得到社会网络提供的帮助。我们在云南省保山市进行调查时,也发现了这种情况。据了解,从保山迁移到缅甸的傣族通常都能得到这一类的帮助。“保山的傣族与缅甸的掸族同文同种,交流起来十分便利。移居到缅甸掸邦等地的傣族,大多投亲靠友,每人可得到5箩种子,并在1到2年内免交粮租。”“移居国外的保山傣族大多居住在缅甸,掸邦、东枝等地有不少来自保山的移民,居住地也是当地掸人的居住地。所以,傣族人移居国外,选择的方式还是投靠同一民族。现在缅甸的掸人还与保山的傣族人有来往,交往的人多有亲属关系。”^①云南的傈僳族移居缅甸,选择的目的地往往是缅甸的密支那,因为那里有一个傈僳人聚居的社区。云南的佤族移居缅甸,选择的目的地则往往是缅甸的佤邦。这些跨境民族之所以选择同一民族的居住地作为移民的首选目的地,原因就在于在这些地区往往存在本民族自己的移民网络。

三是马帮性迁移网络。这种移民网络主要

表现在云南少数民族的移民链中。据资料显示,早在汉朝时期就在云南开辟了“博南道”,在今保山地区设立了永昌郡,保山最西的腾冲与缅甸山水相连,是西南出国的必经门户,因此历史上与缅甸交往甚密。而至近代,通过滇缅印之间的交通线将云南与缅甸、印度等异邦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有的跨国、跨区域商贸经济圈,而联结这个经济圈的一个个链环,就是奔波于这条商道上的云南马帮商人,从而形成了马帮性迁移网络。据记载,19世纪上半叶,滇西腾冲一带回民以这种网络形式移居缅甸:“腾之回教则以城内外、乌索、马家村三地最为著。……嘉道间……旅居缅甸为玉石、宝石、棉花商者半属之^[8]”。斯科特在19世纪90年代探访了缅北回族居住区,他发现大量的潘泰人(对移居缅甸的云南回族的称呼)除了定居在搬弄外,在相去约12英里的南面和东面尚建有“约八十户人家”的两个小村潘尧和帕昌。村中居民大多是从大理、保山、顺宁、蒙化等地及滇南和滇西地区迁移而来的回族移民,斯科特称这些华人穆斯林“全都是商人,拥有骡子和财富”^[15]。

正是因为有以上移民网络的存在,所以广西、云南少数民族向海外的移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即使加以人为的干预,也不能阻断移民的产生。例如,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出于加强边境管理和维护国家形象的考虑,中国政府及广西、云南地方政府针对中越、中老、中缅边民随意互迁的“混乱”现象采取了一些管理和限制措施,但因为这种互迁往往具有复杂的历史、民族、经济等背景,措施执行下来,效果并不明显。例如,20世纪50年代期间,广西十万大山的瑶族中有不少山子瑶还在断断续续前往越南^[16]。

四、结 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中国少数民族也有着悠久的向海外移民的历史。与汉族

^① 2013年10月26日笔者与XIANG先生的访谈录。

移民相比,中国少数民族由于地理、历史、经济、社会和宗教等因素,其向海外移民有着一些独特之处。

在汉族地区,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造成了人们对土地的依赖,加上宗族观念、乡土观念的影响,安土重迁成为一种传统,所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一般不愿离开故土。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则有所不同:一方面,这里的政权强制执行能力较弱,无论是中央政权,还是地方民族政权基本上都是如此,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另一方面,这里的小农经济还不够发达,人们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很低,人们的宗族观念、乡土观念都不够强,所以对移民的态度与汉族地区的农民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就中国少数民族移民而言,广西和云南的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的特点一是国际性移民,二是集体性移民,三是陆路性移民,四是地缘性移民。对广西和云南少数民族移民而言,集聚式移民、发散式移民、强制式移民和自发式移民是其移民的几个主要方式,而生计性迁移网络、亲缘性迁移网络、马帮性迁移网络则为其主要的移民网络模式。相对于汉族移民而言,居住在国境线上的广西、云南少数民族由于与邻国的同源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当他们在这一侧生活不如意时,则会投向邻国的亲友,所以亲缘关系是少数民族移民链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从移民的历史来看,广西和云南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很早就开始了,期间虽表现出断断续续的特征,但移民潮流一直延续至今。

[参考文献]

- [1]黄钰,黄方平.国际瑶族概述[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 [2]范宏贵.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J].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1984(5).
- [3]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侨务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 [4]范宏贵.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 [5]向大有.清代广西向国外移民三大板块背景要素的比较研究(下篇)[J].八桂侨刊,2010(2).
- [6]曹琨.腾越杜乱纪实[M].上海:泰东图书局,1916.
- [7][越]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上)[M].陈荆和编校.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5.
- [8](明)宋廉,等.元史(卷290)[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9](清)朱椿年等.钦州志[M].高州登云楼,清道光14.
- [10]明宣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11]明神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12]陈序经.泐史漫笔——西双版纳历史释补[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
- [13]广西民族研究所.瑶族的历史和文化[M].南宁:广西民族研究所,1998.
- [14]MnssEr. D. S. . J. Aea}ao ,G. HUGO ,A. Kouncucr , A ,Per. LSCarrcc and J. E. TAYLOR.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rllenniwn [M]. Pxford: ClarendonPress.
- [15]安德鲁·D. W. 福布斯. 缅甸的滇籍穆斯林——潘泰人[J]. 姚继德摘译.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3).
- [16]范宏贵. 瑶族从中国迁入越南浅谈[J]. 广西民族研究,1996(4).

[责任编辑 王桃 责任校对 吴奕锜]